

当代经济研究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2012 **11**

编委会成员

主任:林 岗

副主任:王振中 程恩富 白暴力 丁堡骏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堡骏 于光远 卫兴华 弓孟谦 马 艳 王天义
王永锡 王成稼 王振中 王裕国 白暴力 刘 伟
刘国光 刘诗白 严法善 吴易风 宋冬林 张 宇
张彤玉 张薰华 许兴亚 李 扬 李成勋 李其庆
李建平 李 翀 李慎明 陈永志 陈 征 杨 志
杨国昌 杨继瑞 邱海平 孟 捷 林木西 林 岗
郑贵廷 胡乐明 胡代光 胡岳岷 胡培兆 洪远朋
洪银兴 郭铁民 郭殿生 钱 津 高 峰 顾海良
梁洪学 智效和 程恩富 董小麟 鲁从明 简新华
裴长虹 裴小革 颜鹏飞

吉林省教育厅主管

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委托

吉林财经大学主办

主 编:林 岗

副 主 编:程恩富 白暴力 丁堡骏(常务)

编辑部主任:胡岳岷

编辑部副主任:梁洪学

执行编辑:蔡 强

编辑出版:《当代经济研究》杂志社

地 址:长春市净月大街3699号

电 话:(0431)84539199/84539198

邮 编:130117

网 址:www.jlufe.edu.cn

电子邮箱:ddjj@ctu.cc.jl.cn/ddjjy2012@sina.cn

英文翻译:王绍成

刊 名 题 字:启 功

印 刷:长春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5-2674

国外发行代号:BM 4347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公司

(中国国际书店)北京399号信箱

国内统一刊号:CN22-1232/F

国内邮发代号:12-139

国内总发行:长春市报刊发行局

广告经营许可证:吉工商广字02147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局

国内定价:12.00元

当代经济研究

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刊

CONTEMPORARY ECONOMIC RESEARCH

发展与改革论坛

- 论中央企业深化改革与科学发展 潘石 李莹 1
- 论产业生态化的两种形式及其耦合 王国印 7
- 劳动力优化配置与贫困地区劳动力剩余 范方志 李明桥 胡梦帆 13
-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时空演化与区域差异
——基于收入结构的视角 温涛 王小华 宜文 20

《资本论》研究与应用

- 马克思的劳动地域分工理论与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变迁 丁任重 李标 27
- 马克思金融理论的现代性 杨惠昶 赵严冬 孙涵 33

比较与争鸣

- 对“倒U型假说”的一个批判性分析 陈弘 38
-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影响国际价值的新因素探讨 陈永志 张美涛 45
- 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不确定性 丁凯 黄卫平 52

2012. 11 (总第 207 期)

(本刊为月刊, 每月 15 日出版)

CONTEMPORARY ECONOMIC RESEARCH

开 放 视 野

评萨金特的宏观经济因果实证研究

——201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反思 程恩富 方兴起 57

稳定分配理论与市场设计实践的完美合作

——201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论述评 蔡 强 62

宏 观 经 济 研 究

关于扩大消费需求的若干思考 赵振华 尹依灵 67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难点及其破解思路 张桂文 袁晖光 71

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胡 兵 涂春丽 77

财 经 纵 横

制度背景、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异常派现 黄桂杰 83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张秀娥 李 硕 88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难点及其破解思路

张桂文¹,袁晖光²

(1. 辽宁大学 经济学院,沈阳 110036;2. 沈阳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沈阳 110034)

摘要:中国二元经济转型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两难抉择、资源环境与市场需求的双重约束、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等诸多难点问题。通过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多元化道路,以及以多元化发展道路为核心的对策体系,可以化解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就业的双重压力,解决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两难抉择;而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则可以突破资源环境与市场需求的约束,防止市场与政府失灵,确保中国能沿着多元化发展道路,完成由二元经济向现代化一元经济的转型。

关键词:二元经济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多元化道路;技术与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0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11-071-06

一、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难点分析

1. 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两难抉择

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国际环境看,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更是挑战。这一新的国际经济环境要求我们必须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的加速,在国际竞争中,一国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的作用将越来越弱,而基于科技实力的竞争优势则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就使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日益减弱。特别是发达国家利用高科技手段,加强对传统产业的现代化改造,使诸如纺织行业等一些原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样具有竞争优势,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贸易中不仅受到来自发展水平大致相同的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也面临着发达国家利用高新技术手段改造传统产业的严峻挑战。

在知识经济和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条件下,回避竞争是不可能的,闭关锁国更是没有出路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当务之急是改变主要靠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状况和在国际制造业分工中处于简单组装、加工层次的处境。但我国二元经济转型所面临的国内环境则要求我们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解决城市劳动力就业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双重压力。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发展任务是,实现农业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大规模转移和最终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而我国的这一发展阶段与发展经济学家所揭示的标准化模式相比,存在着制造业超前与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进程滞后的特征,使我国在工业化中后期仍面临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解决城市就业的双重压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 2.53 亿人,2010 年农业

收稿日期:2012-09-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146)

作者简介:张桂文(1957-),女,辽宁朝阳人,经济学博士,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和劳动经济研究;袁晖光(1975-),女,黑龙江北安人,经济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政治经济研究。

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仅为 10.1%，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则高达 89.9%，^[1] 中国已从一个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工业经济大国。但农业劳动力比重仍高达 36.7%，农村常住人口仍占总人口的 50.05%。^[2] 据中国劳动部门的统计和预测，目前及今后十几年，每年在城镇寻找工作的劳动力有 2000~2400 万人，而 25 年来每年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平均却只有 1400 万个。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在总体上每年存在着 30% 以上的就业缺口。^[3] 所以，要在实现城市充分就业的同时，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仍需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2. 资源环境与市场需求的双重约束

中国整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工业化中后期是由重化工业向高加工度工业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具有产业链长、资本有机构成高、中间投入品比重大、能源消耗高等特点，因此，进入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资源与环境约束会更加严重。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从资源总量来看，我国是一个资源大国，但由于人口绝对数量庞大，人均资源占有量却很低，属于资源贫国。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1/3，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1/4，^[4] 工业所需要的主要资源如石油、天然气、铁矿、铝土矿等蕴藏量的人均拥有量排在世界第 80 位以后。^[5] 在工业化进程中矿物能源的大规模使用，已经使我们付出了环境严重污染、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活环境质量下降的代价。

我国二元经济转型不仅受到资源环境的约束，还受到市场需求不足的制约。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到 1990 年代末，我国经济运行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转为产品相对过剩的买方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但是，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买方市场是在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不高，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条件下出现的。这种低水平基础上的有效需求不足，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矛盾状态：一方面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中国的需求潜力很大，但资金、技术和各种自然资源却十分匮乏，这要求我们加速经济发展，以克服资金、技术、自然资源条件的不利因素；另一方面，相对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中国现有生产能力过剩，产品实现遇到了严重困难，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受到有效需求不足的制约。

一般而言，在卖方市场条件下，经济发展、结构转换只是受到供给不足、各种生产要素短缺的单方面制约，并不缺乏有利的投资机会；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买方市场，供大于求是经济运行的常态，只要能通过政府宏观调控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经济发展一般不会受到生产要素供给能力的制约；而中国目前出现的这种低水平基础上的经济过剩，使中国二元经济转型既受到资金短缺、自然资源匮乏的影响，又受到有效需求不足的制约，这无疑使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变得更加复杂。

3. 市场与政府双重失灵

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城乡利益关系的调整，面临着市场与政府双重失灵的困境。其中，城乡利益关系调整的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业自身的弱质性，导致社会资源不断流入城市非农产业。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的统一，受自然条件与动植物生长规律的限制，农业生产周期长、季节性显著，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同时存在。因此，与非农产业相比，农业投资风险大，回报率低，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社会资源必然会不断从农业部门流入非农领域。

第二，农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小，完全靠市场调节会出现农业增产与农民增收的矛盾。农产品主要用来满足人们的生活资料需求，受人的生理条件限制，超过生理需求的那部分农产品，人们对其效用的评价趋近于零甚至为负数，因此，农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较小。由于农产品需求变动的幅度小于价格变动的幅度，其销售收入不会随着农产品产量的增长而同比例增长。这样一来，一旦农业产量超过常年的均衡供给量，农产品供给就会大于需求，农民不得不大幅度降低农产品价格，从而出现谷贱伤农，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象。

第三，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及农业经营的分散性，形成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是根据市场价格来调节生产经营行为的，价格上涨就会扩大生产，价格下降就会减少生产。但由于农业生产周期较长，农产品供给量对价格的反应具有较长时间的滞后性，加之分散小农户对价格反应的趋同性，农产品价格上涨，大家会不约而同地扩大生产，使下一个生产周期中农产品的供给大于市场需求，从而导致农

产品价格下降;价格下降又会引发新一轮的减少生产及新一轮的价格上涨,从而形成农产品市场的过度竞争与农业生产的蛛网循环。这种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不仅表现为农产品价格与生产周期性波动所造成的市场风险,还表现为市场机制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失灵。例如,对于一些优质品种,初期只有少数农户生产,由于供给不足,价格较高;较高的价格会吸引多数农户竞相生产,导致该品种农产品供过于求,价格大幅下降。市场机制调节的结果使大多数农户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利益受损。

农业的弱质性及小规模经营,导致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市场对城乡利益关系调节的失灵。解决市场失灵需要政府来弥补,但在经济转型与体制转轨条件下,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和调节城乡利益关系方面也存在着三个方面的失灵表现。

第一,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弱。由于我国二元经济转型滞后,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部门,农业人口众多,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弱,与城市居民相比在利益博弈过程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导致农民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现象,即“三农”问题不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就不会引起决策层的重视,等“三农”问题引起决策层高度重视之时,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已经造成了严重影响,城乡利益关系协调更加困难。回顾我国涉农政策的调整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我国惠农政策的集中出台,通常是发生在“三农”问题已严重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之后。

第二,农村人口众多、居住分散,政策执行成本过高。2010年中国农村常住人口约6.7亿人,农户约1.7亿户,^{[1]⑩}相对如此众多的农村人口和分散经营的农户,任何政策的落实都要付出较高的执行成本。仅以农业补贴为例,直补政策的好处是使农民增加收入的方式更加直接,但问题在于面对6.7亿农民和1.7亿农户,在确定补贴对象、计算补贴数量、发放补贴到户、对补贴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时,均需付出较高的交易成本,执行起来难以保证公正和公平。正因如此,很多农业政策及大多数支农投入下达到有关部门后,经过层层截流,部分会转变为部门收益,再扣除执行中的交易成本,真正使农民得到的实惠不多。

第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部门利益不一致,导致政策执行偏差。政策的执行过程与政策的制定过程一样,也会牵涉多元利益主体的切身经济利益,这些利益主体之间的摩擦和相互掣肘,无疑会影响政策的有效实施。农业政策的执行主要涉及各地方政府,以及为农业服务的涉农部门。“分灶吃饭”财政体制,使各级政府具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和行为目标,体制转轨过程中各涉农部门也都具有了各自的利益目标和行为取向。中央政府从国民经济全局及城乡居民的长远利益出发所制定的各项惠农政策,要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和主要涉农部门(资金、种子、化肥、农药、农产品收购等部门)来贯彻执行,但惠农政策的实施不仅会使各地方政府或涉农部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有可能伤及地方与部门利益,为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维护甚至增加自身利益,各政策执行机构往往会通过“层层截流”、“曲解规则”、“补充文件”和“改头换面”等各种变通方式,与中央政府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格局,从而导致政策执行的偏差。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为缓解“三农”问题的压力,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是由于执行不力,许多惠农政策或是流于形式或是在执行中走样,难以收到实效。

二、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多元化道路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面临的诸多难点问题,是在新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克服这些难题,必须扬弃那种在经济发展中非此即彼、片面强调某一路径选择的传统思维;统筹城乡发展,通过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良性循环,促进二元经济转型,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转型的多元化发展道路;同时还要在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及城市化三个主要途径上寻求新的突破点,形成切合实际并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体系,通过多种方式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1. 转型道路的国际比较与多元化发展道路的必要性

对于二元经济转型问题,发展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发达国家从二元经济向现代化一元经济发展的历史,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结构转换的实践,也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

训。对于二元经济转型问题的研究,最著名和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前者强调城市工业的扩张,后者强调农村经济的发展,代表了二元经济转型的两种不同路径。

刘易斯模型实际上是对英、美、法、德等发达国家二元经济转型道路的高度抽象。上述这些国家的确是主要通过城市工业扩张,实现了从二元经济向现代化一元经济的转型,但这一转型道路并不像刘易斯模型所概括的那样顺畅。尽管工业化先行国家占尽了资源与市场优势,但这一过程仍充满了对抗、冲突、艰辛和苦难。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城乡二元对立,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也大都经历了自发、无序城市化所造成的“城市病”与“农村病”。实际上,随着发达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为了解决日益突出的城乡矛盾,各国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中后期发展阶段,都不约而同地实施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政策转变。而这一转变过程恰是刘易斯这一高度抽象模式没能概括出来的。正是由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中后期阶段,统筹城乡发展,才能促进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全面现代化。

受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曾普遍制定和实施了以城市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这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推进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了许多缺陷和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两点:一是造成农业生产的长期停滞,农村经济的严重落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20多年中,发展中国家人均粮食产量和人均农业产值的年均增长率都不到1%,20世纪60年代农业中这两项指标的增长率都大大低于20世纪50年代。^[6]二是农业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造成了城市人口的过度膨胀,带来了城市在食品与饮水供应、就业、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巨大压力,引发了较为严重的“城市病”,这在拉美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都被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城乡双重失业问题所困扰。

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上述问题,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对传统发展经济理论与模式的反思。针对刘易斯模型的不足和发展中国家日益突出的城市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阐述了他的二元经济模型。^[7]该模型认为消除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办法不是依靠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是如何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能力,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在理论反思的基础上,一些国家开始重视农业发展,将战略重点从工业转向农业,从城市移向农村。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上,也开始探索通过发展农村工业的办法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转移,以避免过度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病”。在通过发展农村工业来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工业化进程。但是,受体制转轨过程中城市工业竞争力增强与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双重影响,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乡镇企业超速发展的条件已不复存在;而且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的发展模式直接导致了企业布局的分散化,使其难以发挥工业发展的聚集效应,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同步发展。

实践证明,实行以城市工业为中心的片面工业化的道路固然已经为经济发展的实践所否定,但人为地割裂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只通过农村工业的发展来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是行不通的。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二元转型,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借鉴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理论和其他国家二元经济转型的经验教训,遵循经济发展与结构转换的一般规律,扬弃那种在经济发展中非此即彼、片面强调某一路径的传统思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发展道路。

2. 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多元化发展道路的可能性

在中国二元经济转型过程中,实行多元化发展道路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这主要是由中国这一人口与地理大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决定的。^②

(1)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使我们有可能根据城市和农村以及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协调城乡间及不同地区间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之间的关系,保证我们在二元经济转型过程中,既能够带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缩小工农与城乡差距,又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2)收入差距与生活水平上的不平衡反映了城市与农村以及各地区需求结构上的差异,这种多样化和多层次的需求结构,有利于带动我国产业结构梯次升级,既可以防止居民消费需求的同步振荡,又可以延长产业的经济寿命,避免一些产业因缺乏长期成长的市场空间而过早地成为夕阳产业。

(3)经济发展不平衡使我们可以一个国家的范围内,通过产业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梯度转移,形成雁行经济发展格局,从而避免发达国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出现的产业空心化、低层次产业发展的需求约束和资源与技术的过度外流。

我们强调经济发展不平衡为我们通过多元化道路实现二元经济转型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会为此去刻意追求和扩大这种不平衡,相反,我们会正视这种不平衡的现实,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利用其对保持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有利一面,通过多元化道路,来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达到缩小差距,最终消灭差距的目的。

3. 多元化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

促进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多元化道路,是指扬弃那种在经济发展中非此即彼、片面强调某一路径的传统思维,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方式来实现二元经济转型。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两点:第一,通过多种途径促进二元经济转型。即在二元经济转型中把推进工业化进程与改造传统农业相结合,同时要大力促进城市化发展,通过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与非农产业共同发展,城市与乡村共同繁荣,市民与农民共同富裕。第二,在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及城市化三个主要途径上寻求新的突破点,形成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对策体系,通过多种方式促进二元经济转型。以上两点具体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在工业化发展上,强调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扩大非农产业就业、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为重点,制定工业化发展的对策措施。通过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互促进,在继续推动第二产业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依托城镇网络体系发展产业集群;把促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相结合,促进城乡工业的合理分工及协调发展;把工业化推进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相结合,通过产业梯度转移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化进程。

(2)在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建设现代农业的物质支撑体系;树立大农业发展观,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调整农业结构,推广生态农业,发展可持续农业,开发旅游农业,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加强对农业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和有效利用,以及发展农业的多种经营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加强人力资本开发,构建现代农业的人才支撑体系;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3)在城市化发展道路上,要突破那种集中式城市化道路与分散式城市化道路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模式,把农业人口向大中城市转移与促进农业人口向小城镇集中结合起来,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通过城市群的发展,构建网络化城市体系;通过农民工市民化,提高城市化质量;统筹城乡建设规划,实现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发展的良性互动。

三、以创新促进中国二元经济转型

能否顺利地实现二元经济转型不仅取决于我们是否找到推进二元经济转型的发展道路,还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通过技术与制度创新来突破二元经济转型中所面临的资源环境与市场需求的双重约束,克服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在现实生活中是密切联系的,这种联系不仅体现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相互促进、互为条件的关系上,而且还表现在二者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是密不可分的。技术创新从人与物的关系出发,主要通过生产函数的改变,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并为进一步制度创新奠定基础;制度创新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主要通过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减少生产过程中的X—非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同时为技术创新提供动力机制和良好的外部条件。在二元经济转型过程中创新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创新可以突破二元经济转型中资源与环境的制约,通过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解决在多元化

发展道路之间合理配置资源的问题。在缺乏创新的条件下,单纯依靠资本积累不仅不可能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还会由于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转换的非均衡,进一步扩大二元经济结构的反差强度。问题的要害在于,在发展中国家就业压力过大、资源短缺的制约下,如果缺乏创新带动,短缺资源就不能满足两大部门平衡发展的要求,从而难以在工农业两大部门之间形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得不到根本改造。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以创新为基础来促进两大部门的协调发展。这是因为创新可以通过生产函数的改变,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使经济运行突破资源约束,获得持续发展。在创新的带动下,现代工业部门能够以较少的资源投入获得较快发展,一方面保证了工业部门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农业内部保持较多积累,使农业部门有可能通过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会进一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水平,扩大对工业品的市场需求,促进工业部门发展,从而形成工农业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

第二,创新能够开拓新的市场,创造新的需求,有助于克服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需求不足的制约。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生产不仅仅是被动地适应市场需求,还应不断地创造新需求,开拓新市场,技术创新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技术创新可以开发出新的产品,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带动新的产业发展。当创新活动集中出现时,就会在 market 需求的带动下,出现新的产业群,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通过就业率的提高促进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进一步扩大市场需求。在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一般来说长期的经济萧条、通货紧缩常常是与创新不足有关,而持续的高速增长也往往是技术进步的结果。

第三,创新有助于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由于农业属于弱质产业,涉农领域中的市场调节难以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更不可能形成和谐的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通常市场失灵需要政府来弥补,但二元经济条件下,农业人口众多,加之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缺失,在解决“三农”问题和调节城乡关系方面也存在着政府失灵。解决市场与政府双重失灵,既不能完全依赖市场,也不能完全依赖政府,只能通过制度创新,一方面,创造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尽可能降低市场失灵程度;另一方面,增强农民在制度博弈中的讨价还价能力,约束政府行为,最大限度地避免与克服政府失灵,进而建立起和谐社会目标下公平的社会共享的社会制度体系。^[8]

现阶段技术创新的路径选择,不宜采用单一标准,应走资本节约型与劳动节约型相结合的技术创新道路。现阶段制度创新的重点是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与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农村金融体系和农村合作组织创新等。

注 释

- ①农户数根据《2011 中国统计年鉴》中每户农村家庭平均人口数计算所得。
- ②李京文等学者较早地从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发展的拉动作用、社会需求的多层性,以及保持价格相对低廉的后备劳动大军等方面,分析了经济发展不平衡对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作用(参见:21 世纪中国经济大趋势[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183-184)。

参考文献

- [1] 2011 中国统计年鉴[OL]. 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
- [2] 2011 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OL]. 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
- [3] 王诚. 劳动力供求“拐点”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J]. 中国人口科学, 2005, (6): 7.
- [4] 陈佳贵等. 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05 年)[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62.
- [5] 王建. 大变革时代的思考[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48.
- [6] 陶达文. 发展经济学[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8: 213.
- [7] 谭崇台. 发展经济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327-342.
- [8] 苏春红. 和谐社会目标下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政府责任[J]. 经济纵横, 2008, (4).

责任编辑: 孙立冰